

传世名著百部

史通

之

蓝天出版社



* T 0 2 9 9 2 8 *



● 郭超
夏于全

主编

传世名著百部

历史与史学名著·第十五卷

(全 100 部 64 卷)

蓝天出版社

第十五卷目录

传世名著百部之《史通》

●名著通览	(3)
●全文	(7)
史通序录	(7)

内 篇

卷 一	(8)
六家第一	(8)
卷 二	(14)
二体第二	(14)
载言第三	(15)
本纪第四	(16)
世家第五	(18)
列传第六	(19)
卷 三	(20)
表历第七	(20)
书志第八	(22)
卷 四	(30)

论赞第九	(30)
序例第十	(32)
题目第十一	(33)
断限第十二	(35)
编次第十三	(37)
称谓第十四	(39)
卷 五	(41)
采撰第十五	(41)
载文第十六	(44)
补注第十七	(47)
因习上第十八	(48)
因习下第十九	(50)
卷 六	(52)
言语第二十	(52)
浮词第二十一	(55)
叙事第二十二	(58)
卷 七	(65)
品藻第二十三	(65)
直书第二十四	(67)
曲笔第二十五	(68)
鉴识第二十六	(71)
探賾第二十七	(72)
卷 八	(75)
模拟第二十八	(75)
书事第二十九	(79)
人物第三十	(83)
卷 九	(85)

核才第三十一	(85)
序传第三十二	(86)
烦省第三十三	(88)
卷十	(90)
杂述第三十四	(90)
辨职第三十五	(93)
自叙第三十六	(95)

外 篇

卷十一	(99)
史官建置第一	(99)
卷十二	(105)
古今正史第二	(105)
卷十三	(118)
疑古第三	(118)
惑经第四	(124)
卷十四	(130)
申左第五	(130)
卷十五	(135)
点烦第六	(135)
卷十六	(143)
杂说上第七	(143)
卷十七	(150)
杂说中第八	(150)
卷十八	(156)
杂说下第九	(156)
卷十九	(164)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	(164)
五行志杂驳第十一.....	(172)
卷二十.....	(177)
暗惑第十二.....	(177)
忤时第十三.....	(183)

传世名著百部之

史通

名著通覽

《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唐刘知几撰，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该书的刊本流传不多。到了明代，重经多人校定刊行世，以万世三十年张鼎思刻本为最完善，其常见的注释本有陆深的《史通会要》、李维桢、郭孔廷的《史通评释》、王维俭的《史通训故》；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训故补》；而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8年将该书校点重印，并附录了陈汉章的《史通补释》、杨明照的《史通通释补》和罗常培的《史通增释序》3种，为现行最好的版本。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出身于世代官僚并以文词知名的家庭，自幼博览群书，“喜谈名理”，20岁考中进士，步入官场，一生中做过主簿、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等官。他初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再以凤阁舍人监修国史，复以秘书少监领史事，“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史学中。他的著作很多，大都失传，《史通》是他数十年钻研史学的结晶，也是唯一流传至今的著作。

《史通》全书20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10卷，均为专题论文的形式。内篇39篇，其中《体统》、《纪传》、《弛

张》三篇早已亡佚，仅存目录，故今内篇为36篇；外篇13篇。全书共49篇，连同自注，约有8万8千多字，书中每篇都有明确的范围和论点，同时内外篇又互相联系和补充，构成一个较严整的体系。

《史通》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以表述如下：

1. 全面地分析和总结了唐以前的史学源流、史书体例和史官制度。《史通》将古代史学分叙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又将六家归结为纪传和编年两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长短得失一一作出评述。刘知几还把纪传、编年二体总称为“正史”，正史以外的其他各种史书则统称为“杂史”。杂史可细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十种，从而全面地概括了古代史籍的分类情况。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知几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2. 对历史编纂学的体例、方法、原则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编篡体例方面，《史通》论及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各自得失。在《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中，刘知几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体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详加分析，认为本纪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屈”，则是列传的任务。《史通》作者反对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谬乎？”对于书志，则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对于各史的论、赞，也多持批评态度。

在编篡方法上，《史通》涉及范围更广，论及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慎省等十余

种问题。刘知几指出叙事是写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忌繁芜之失，应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写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并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记述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病。对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刘知几亦认为不仅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而且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以上各种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明确地提出了治史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三者中尤以史识为重的思想，为史家指出了修养的基本方向。此“三长论”，时人“以为知言”，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4. 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认为论述天下兴亡应以人事为主，并提出了“善恶必书”，反对“曲笔诬书”等一系列修史原则，刘知几认为国家的成败兴亡，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天命，“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史学家撰写历史，应“以实录直书为贵”，“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在《惑经》、《疑古》等篇中，刘知几对孔子、《春秋》、《尚书》等圣人、经书提出了疑问和指责，对后人震动不小。

5. 反对泥古，具有进化的历史观。刘知几在《史通》中强调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古往今来，质文递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明确地提出了“随时”的主张，反对那种“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的不通世务、不合时宜的复古思想。

《史通》总结了古代史学的成就，探讨了主要史书的体例、方法等，从而建立了史学批判、史学史以及史书编纂学的原则基础，继往开来，把中国古代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为我国史学中的不朽著作，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通》问世后，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知友徐坚赞叹道：“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旧唐书·刘子玄传》）明代王维俭认为：“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益于后学。”（《史通训故序》）清人钱大昕则云：“刘氏用功既深，遂立言而不朽。”（《十驾斋养新录·史通》）近人梁启超也认为：“自有刘氏、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近现代的许多学者，如吕思勉、白寿彝、刘杰、朱杰勤、陈光崇、高国杭、王树民等，都对《史通》作过较深的研究，并有论著发表。

金

文

史通序录

唐凤阁舍人彭城刘子玄 撰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自惟历事二主，从官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人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篋。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日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

内 篇

卷 一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占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椎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铃》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惟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劼，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裁令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篇，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体制，乃似孔氏《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

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按《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檮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月，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上传去声，下传平声。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

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经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以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附《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同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占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耀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譬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大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